

## 戰爭與翻譯：抗戰時期中國的譯者與翻譯活動

黃克武 Ko-wu HUANG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以來中國的譯者與翻譯活動多圍繞著啟蒙與中國現代性的追尋，無論是早期的傳教士馬禮遜、傅蘭雅到知識分子如嚴復、梁啟超等人，均以溝通中外、引介西學來啟發民智。至 1930-40 年代受到中日戰爭的影響，翻譯活動出現一個新的面貌。抗戰時期的翻譯活動與中日和戰、蔣汪分裂，以及國共競爭等因素有密切的關係，譯者也從個人發展到群體，而有許多編譯組織的出現。本文以二十世紀上半葉，從九一八至抗戰勝利為時間斷限，探討戰爭對譯者與翻譯活動之衝擊。首先將描述國人如何利用翻譯作品譯介外人對中國情勢與中日民族性、國民性之觀察，以凝聚民心並宣傳持久抗戰之信念。其次探討三類群體的翻譯活動，第一是蔣介石支持賀麟於 1941 年成立的「外國哲學編譯委員會」。該會譯介西方哲學書刊，如賀麟譯斯賓諾莎的《致知篇》、陳康譯柏拉圖的《巴曼尼得斯篇》，以及謝幼偉譯魯一士的《忠之哲學》、樊星南譯魯一士的《近代哲學的精神》等，以從事抗戰建國之精神建設。第二是汪精衛派在香港所從事的編譯活動。當時周佛海所主持的「藝文研究會」在香港的分會成立「國際編譯社」，發行刊物，刊登翻譯文章。該社由林柏生主持一切總務，梅思平主編國際叢書，樊仲雲主編國際週報。此一編譯社不但報導國際輿論，亦宣傳汪派中日親善的政治主張。第三是中共在重慶利用中蘇文化協會與《中蘇文化》一雜誌所從事的譯介工作。此一協會從 1935 年至 1949 年，宗旨為促進中蘇文化交流。會長原為孫科，1940 年改組之後中共成為主導力量。由郭沫若任研究委員會主任，王昆侖任雜誌委員會主任，侯外廬與翦伯贊為副主任。透過此一刊物可瞭解中共如何透過譯介蘇聯文化而傳播馬克斯主義。抗戰時期的翻譯活動是戰爭動員的一個環節，各方人馬一方面凝聚抗戰建國、驅逐日寇之共識，另一方面因為對戰爭情勢的不同評估，以及本身政治信仰之差異而造成分裂。蔣派譯介西方思潮、汪派與中共則分別譯介日本與蘇聯之觀點。抗戰時期的翻譯活動與文化政治奠定國共內戰與冷戰時期美蘇對峙的重要基礎。